

· 主编特邀(Editor-In-Chief Invited) ·

编者按：尽管社会学家对于社会阶层的研究已逾百年，但是心理学界真正对其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是近些年来才逐渐兴起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群体分类和易于被个体改变的身份标签，而常常成为人一生都难以超越的文化烙印。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近年来我国社会贫富分化在持续加剧，阶层固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研究中国当下社会中的阶层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郭永玉教授及其团队近几年一直致力于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并将其应用于理解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公平问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鉴于该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本刊特邀郭永玉教授撰写此文。作者在展现社会阶层心理学现有理论与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他们团队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们希望通过郭永玉教授等人的文章，进一步推动社会阶层心理学在国内的开展，为探索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相关心理学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责任编辑：李纾)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郭永玉 杨沈龙 李 静 胡小勇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摘 要 社会阶层代表了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对自身所处社会等级的感知。社会阶层因其概念的独特性、功能的广泛性、影响的深刻性和结论的系统性，成为了心理学中的前沿热点领域，目前主要有劳动、健康心理、社会文化、等级和社会认知五种研究视角。基于现有视角对社会阶层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围绕不同阶层感知公平的差异、社会公平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作用以及低阶层感知不公平的应对策略三个方面开展了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概念辨析、理论整合、加强应用研究等角度来推进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心理学；社会公平；社会认知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在 2014 年底举行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著

名经济学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 Summers 指出，在面对不平等问题上，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挑战，仇富更是已成为全球共同的现象。在美国，最富有的 1% 的人所得的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 21%。那么中国的情况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4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9。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国际标准警戒线，显示了我国社会依然存在着很严峻的贫富分化状况。

当然，基尼系数只是一个客观数据，如果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流动是畅通的，低收入群体可以

收稿日期：2015-04-29

^{*}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71171094)；(2)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重大培育项目之重大学术成果培育计划：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CCNU14Z02018)。

通讯作者：郭永玉，E-mail: yyguo@mail.ccnu.edu.cn

共同第一作者：杨沈龙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存条件,那么即使社会存在着分层现象,社会矛盾也不会过于激化,反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戴海东,易招娣,2012;盛智明,2013)。然而,当前我国机会不公、阶层固化的现象恰恰使得基尼系数带来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白天亮,曲哲涵,2010)。在李春玲(2010)的研究中,多项指标一致显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不仅没有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很多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反倒还有明显上升,如管理人员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5.1倍,城市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是农村人的6.3倍。除了教育公平,就业公平的问题同样突出,一项全国性样本的调查表明,高校毕业生的求职结果和起薪均显著地受到家庭收入、城乡和父母职业的影响,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生的就业越有优势(岳昌君,张恺,2014)。近年来我们频频可以听到像“官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农民工二代”这些说法,也恰恰反映了阶层纵向流动缺乏公平机制,下层个体向上层流动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样的社会现实。

由上可知,阶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会长期地存在,而且还将对社会的发展变革带来长远的影响。因此,对社会阶层的科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社会阶层的研究引发了学术界多学科的强大兴趣,具体到心理学,短短几年间对社会阶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研究上都有很多重要的成果,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社会阶层心理学开始产生(Kraus & Stephens, 2012)。

2 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心理学:从一个变量到一个领域

心理学研究者对社会阶层(social class)^①的关注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它更多地是作为人口学变量被考虑。但是如果那时有学者提出应该将阶层作为心理学的一个独立主题,似乎也没有必要。这主要是由于在心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① social class, 指的是社会阶层或社会阶级,在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有关“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语境中,通常译为社会阶级,而现当代社会科学文献中更多地将其译为社会阶层。因此本文,在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及相关语境时,将其译为社会阶级,而其他部分均译为社会阶层。

美国,阶层一度被认为是一种相对表浅的社会分类标准,是一种对人的心理几乎构不成多少影响的属性;而且一个人的阶层被认为是比较容易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的(Kingston, 2000),这与其美国梦(American Dream)和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的信仰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阶层不仅客观存在,相对固化,而且会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带来很多根源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高低阶层者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心理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又反过来维护甚至加剧了阶层的固化(Stephens, Markus, & Phillips, 2014)。这使得一些心理学家意识到,阶层不只是一个时期某一时期的标签,而常常是人终其一生要经历、共享并打下深刻烙印的一种社会背景(Markus & Kitayama, 2003, 2010; Kraus, Tan, & Tannenbaum, 2013; Stephens & Townsend, 2013)。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推动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系统逻辑性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形成了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的初步脉络(Kraus & Stephens, 2012)。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描述作为一个变量的社会阶层,到作为一个领域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2.1 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资源(收入、教育和职业)的差异以及主观上感知到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 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2014)。由此可见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成分。客观社会阶层以个体生活中享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为核心,而为了标定这一复杂的综合体,研究者渐渐达成了以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来作为其测量指标的共识。研究者常常根据研究目的灵活地选用这些测量指标(任春荣,2010)。主观社会阶层以感知到的相对等级为核心,是个体同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时,对自己在社会层级中相对位置的理解和感受(Kraus et al., 2012)。很多研究都表明,对于要考察的因变量,主观阶层比客观阶层的预测力更强(Kraus et al., 2013; 胡小勇等,2014),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对主观阶层的关注(王春光,李炜,

2002; Kraus & Stephens, 2012)。目前比较主流的思路是在研究中综合考察主客观阶层, 有的是在一个研究中分别检验主客观阶层的独立效应(Kraus, Côté, & Keltner, 2010; Kraus, Piff, & Keltner, 2011), 有的是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将主客观作为两个显变量合成为一个阶层潜变量(周春燕, 郭永玉, 2013a), 还有的学者综合主客观成分, 开发了新的阶层测量工具(胡壮丽, 王孟成, 蔡琳, 朱熊兆, 姚树桥, 2012)。

除了测量, 对主观阶层进行操纵是近年来一种新的思路,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社会阶层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取向——等级视角(rank-based perspective)的诞生(Kraus et al., 2013) (详见 2.2.2 部分)。对主观阶层进行操纵, 是在实验室启动被试暂时体验一种处于更高或更低阶层的感受, 例如让被试想象自己和社会最高层的个体进行比较以启动其主观低阶层感受(Piff, Kraus, Côté, Cheng, & Keltner, 2010), 或者让低阶层穿上商务正装以启动其主观高阶层感受(Kraus & Mendes, 2014)。操纵主观阶层的优势是, 它能够克服调查法仅限于揭示相关关系这一缺陷, 进一步考察社会阶层与其他变量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 很多研究显示, 仅仅是短暂的阶层启动, 就能使被试表现出那些长期处于某阶层的个体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Kraus et al., 2013), 这使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具有了充分的可行性。

2.2 社会阶层心理学

2.2.1 为什么心理学要系统地研究社会阶层

在社会学领域, 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已经跨越了几个世纪, 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Durkheim、Marx 和 Weber 都曾对其做出过卓越的贡献。然而这些经典的理论主要立足于宏观的社会和群体水平, 真正从微观个体水平来考察社会阶层对心理和行为影响的理论和研究是很少的(Kraus & Stephens, 2012)。直到近二十年来, 随着研究的积累, 社会阶层研究对于心理学的独特价值开始慢慢凸显, 在大量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积淀下, 实现了从一个变量发展为一个领域的突破。那么为什么心理学需要从一个研究领域的定位出发, 系统地考察社会阶层呢? 笔者认为, 这主要基于社会阶层的如下特点。

第一, 内涵的独特性。作为一种基于等级的社会分类形式, 社会阶层也许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权力(power)、地位(status)、种族(race), 这些概念从某种程度来说, 与社会阶层有一定的平行与重叠。然而, 与这些等级形式相比, 社会阶层有其独特的内涵。它不同于权力, 权力是基于特定组织、特定情境的, 离开了特定条件, 一个人高权力的特定表现也会弱化, 而阶层经历对人的影响确是稳定而持久的(Johnson, Richeson, & Finkel, 2011)。阶层也不同于地位, 地位是指个体在他所生活的实体社交圈子获得的尊重和钦佩的程度(Anderson & Kilduff, 2009), 而有的研究恰恰表明低阶层常因为其更具亲社会倾向而受到尊重(Flynn, Reagans, Amanatullah, & Ames, 2006), 由此可见阶层所具有的复杂性。阶层更不同于种族, 种族虽然也能带给人深刻的心理烙印, 但与之相比, 阶层给人的感觉更为内隐(Kraus & Keltner, 2009), 而且同一种族内部也有阶层, 这时的阶层差异是种族研究完全不能解释的。

第二, 功能的广泛性。社会阶层对一个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直至人生发展具有广泛的预测效力。从生理上来讲, 高阶层拥有比低阶层更好的健康状况(Wolff, Subramanian, Acevedo-Garcia, Weber, & Kawachi, 2010), 更为长寿(Demakakos, Nazroo, Breeze, & Marmot, 2008); 从心理上来讲, 高阶层比低阶层有着更高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Ng & Diener, 2014)和更少的情绪问题(Sakurai, Kawakami, Yamaoka, Ishikawa, & Hashimoto, 2010); 从行为上来讲, 高阶层比低阶层有着更少的亲社会行为倾向(Piff et al., 2010), 却有着相对较多的展现自我的行为(Stephens, Markus, & Townsend, 2007); 最后, 从人生发展的角度来讲, 高阶层比低阶层有着更好的学业成就和职业发展(Stephens, Markus, & Fryberg, 2012).....高低阶层的差异存在于方方面面, 一个人的阶层对其一生的影响是广泛而全面的。

第三, 影响的深刻性。社会阶层心理学的观点认为, 高低阶层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差异, 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的。正是由于阶层属性可以影响到个体深层的心理基础, 以此为中介, 才引发了不同阶层迥异的外在特征。例如 Stephens 等(2014)在分析阶层不平等的心理根源时, 提出了高低阶层者自我的本质差异: 中产阶层所处的文化环境塑造了其独立的文化信念, 即更多地表达自我偏好, 强调与众不同, 研究者称

这种自我为表达的独立性(expressive independence);而工薪阶层则强调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依赖于他人支持的,这使其形成了适应环境、坚忍不拔、和谐乐群的心理特点,研究者称之为坚韧的互依性(hard interdependence)。Stephens 等认为,正是这种文化自我概念的差异,导致高低阶层者一系列行为模式的不同。

第四,结论的系统性。对阶层差异的深层心理机制的探讨,使数量庞大、角度各异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呈现出体系化、逻辑化的特点,而不再是零散的、基于各自表述的研究结论。例如 Stephens 等(2014)所强调的不同阶层自我的差异,就可以统合很多具体方面的研究结论,下面我们还会有具体的介绍。当然,由于该领域形成不久,还不可能出现一个很成熟的大理论来统一所有社会阶层的研究结论,而是有几个并存的研究取向分别构建自己的体系。所幸各取向在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上并无太大争议,因此它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基本关切和对研究结果的理论解释上。

2.2.2 心理学怎样研究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根据 Kraus 等(2012)的总结,在当时共有三种主要的社会阶层研究取向,加上 Kraus 团队 2012 年和 2013 年先后提出的两种新视角,共有五种流行的取向,下面依次简要介绍。

劳动视角(labor perspective)可以追溯到 Marx 和 Engels 的资本论与阶级斗争学说。这种视角将人按照人际间的劳动关系和对生产工具的占有进行分类,并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可以很清晰地把握社会中的人们区分为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而各种社会组织强化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并控制着劳动阶级的生活。劳动视角的理论虽然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从其研究来看,它还不具有明显的心理学色彩。不过,劳动视角还是对后面出现的几种研究取向产生了一定的启发(Kraus et al., 2012)。

第二种取向是健康心理学视角(health psychology perspective)。最早,医学研究发现低阶层者比高阶层对疾病更为易感,这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关注。其后多年的研究发现,高阶层确实在很多健康方面都要优于低阶层,既包括身体的,也包括心理的(Adler et al., 2008; Howell & Howell, 2008)。不过,尽管这一取向也试图从环境背景和心理根

源两个层面来探讨这种差异的深层成因(Gallo & Matthews, 2003; Wilkinson, 1999),但根据学界的观点,它还尚未形成特别具有解释力的成熟理论(Stephens, Markus, et al., 2012)。

真正具有较大影响和较为成熟理论的,是社会文化、社会认知和等级视角三种取向,而其中社会文化视角成型最早,也对其他两种视角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Kraus et al., 2012)。社会文化视角(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将阶层看作一种为同一阶层个体所共享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形式,并在一种阶层的内部塑造出具有阶层特异性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与健康心理学视角只关注健康不同,社会文化视角极大地扩展了社会阶层研究的关注面,考察了高低阶层在生活中多种文化载体上的差异,例如风俗(Bourdieu, 1985)、艺术(Snibbe & Markus, 2005)等,并且对于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也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解释。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Stephens 等从不同阶层的文化所塑造的不同自我出发,来解释高低阶层在学业适应(Stephens, Fryberg, Markus, Johnson, & Covarrubias, 2012; Stephens, Townsend, Markus, & Phillips, 2012)、身心健康(Stephens, Markus, et al., 2012)和社会不平等(Stephens et al., 2014)等方面的差异。可以说,社会文化视角的很多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是当今社会阶层心理学不可或缺(Grossmann & Huynh, 2013),但是其理论体系相对比较庞大,在不同研究中所涉及的文化的內容不完全一致,加之文化、自我等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模糊性,这使得其理论结构不够清晰,还缺乏一个更统合的理论模型。

社会认知视角(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由 Kraus 及其同事于 2012 年提出,与社会文化视角一样,它所关注的阶层差异同样广泛,从基础的生理反应到复杂的社会互动。但对于深层根源的解释上,它强调是高低阶层基本认知风格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多方面的不同:低阶层者掌握资源较少,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形成了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更容易认为个体自身的生活和发展主要受到了情境因素的影响,不论是心理还是行为都表现出了外部定向的特点;而高阶层资源相对丰富,长此以往使得他们对于外部力量的依赖比较弱,更多地将自身生活与自己个人的特质和努力相联系,形成了唯我主义

(solipsism)的认知风格,倾向于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Kraus et al., 2012)。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Kraus等(2012)进一步解释了高低阶层在自我、社会知觉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例如在自我方面,情境主义的模式使得低阶层的自我控制感较低,而对来自外部的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信息更敏感;相反,高阶层唯我主义的风格则使之控制感较高,不大在意环境的影响(Côté, 2011; Kraus, Horberg, Goetz, & Keltner, 2011)。再如社会知觉方面,情境主义风格的低阶层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并且对社会事件有着更多的外部归因倾向,而高阶层同理心较弱,也更多强调事物的内因(Kraus et al., 2010)。在人际关系上,低阶层依赖外部、关注情境的特点使他们表现出比高阶层更高的亲社会意向(Kraus, 2010; Piff, Stancato, Côté, Mendoza-Denton, & Keltner, 2012)。总之,社会认知视角高度强调唯我主义与情境主义这一基本认知风格的差异,并以此来对高低阶层多方面的差异做出解释。

最后来看等级视角,虽然也是Kraus团队提出的,但Kraus等(2013)强调,它并非社会认知视角的更新和升级,而只是一种并存的思路。等级视角最主要的新意,是它高度强调主观阶层对个体的影响。它用以解释阶层差异的心理根源,既不是文化,也不是认知,而是个体通过与别人比较,形成的关于自己在社会层级中相对等级排名的感受和认识。等级视角的这一主张,也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实证数据支撑的。前文有过介绍,通过操纵主观阶层,就能让被试暂时切换成另一阶层的行为模式。例如,穿上运动裤(启动低阶层感)的被试就能表现出比穿上商务正装(启动高阶层感)的被试更强的同理心(Kraus & Mendes, 2014)。还有研究表明,客观阶层对个体自尊的影响是通过主观阶层的中介作用的(陈艳红,程刚,关雨生,张大均,2014)。这些研究都很好地展现了主观阶层的重要性,但因为等级视角是最晚提出的,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在主观阶层到结果变量之间是否还有其他深层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也需进一步地挖掘。

3 社会阶层与社会公平的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由前文可知,在关注阶层差异时,不同取向

除了对这些差异的心理根源存在理论解释的分歧之外,它们具体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健康心理学视角更关注身心健康差异;社会文化视角主要揭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最近也在教育和健康领域有一些研究;社会认知视角明确地提出了自我、社会知觉和人际关系三个研究领域;等级视角基本上延续了社会认知视角的核心变量。各取向一起,构建起外延广阔的社会阶层心理学体系。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各取向均没有太充分的关注,那就是社会公平问题。可以说,阶层这一概念本身就涉及公平与不公的问题,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不公平的问题又尤为突出,而现有的社会阶层心理学体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明显不够。尽管社会文化视角针对阶层不平等的固化现象做过阐述(Stephens et al., 2014),但是一系列重要的阶层与公平问题还有待更深入地探索。

基于此,“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课题组(下文简称“课题组”)近两年尝试将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理论前沿和社会公平的现实问题相联系,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分别是不同阶层感知公平的差异、社会公平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作用以及低阶层感知社会不公的应对策略,每个方面又都包含了三个具体的问题。在研究视角方面,课题组主要基于社会认知的视角,原因有三:首先,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主要是以不同阶层对公平的感知为基础,这与社会认知视角的基本关切和基本理论有着本质的联系;其次,尽管文化视角在解释社会不平等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它所强调的“文化”完全以美国文化为中心,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还有待检验,而且社会文化视角过于宏观,而我们研究的是相对微观、具体的问题。最后,虽然社会认知视角目前对公平问题关注较少,但它所述及的社会归因、威胁敏感性、控制感等内容,与社会公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形成一套清晰的理论模型框架,为我们所借鉴。

3.1 不同阶层感知公平的差异研究

3.1.1 不同阶层对于贫富差距进行归因的差异

人如何感知公平,又为什么会觉得社会不公呢?对此前人研究考察了多种因素的作用,对这些因素的比较研究发现,对公平感预测力最强的是个体归因方式(Ng & Allen, 2005)。也就是说,个体是否感到公平,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于

事件结果的归因。例如,个体对贫穷或富裕的归因倾向对分配公平感具有显著的影响,如果倾向于内归因(如将贫富归因为个体能力不同),其分配公平感就较强;反之,若倾向于外归因(如归因为机会不平等),其分配公平感就较弱。而这一结果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样本中均得到了有力的支持(Whyte & Han, 2008; 王甫勤, 2011)。可见,个体如何对于经济结果进行归因,是其感知社会公平的一个基础因素。因此,课题组首先探讨不同阶层如何看待个体间贫富差距,是将其看作是制度、社会环境的原因(外归因),还是将其视为个体不同努力程度、能力水平的原因(内归因)。

根据社会认知视角的观点,高阶层者更倾向于对事件做内归因,低阶层者则更倾向于做外归因,那么这一观点是否同样适用于贫富差距归因倾向呢?为了比较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中国社会阶层与贫富归因之间的关系,课题组编制了信效度良好的贫富差距归因问卷,广泛调查了广东、湖北、贵州等多个省份的1000余名城乡居民。结果显示主观阶层水平对于贫富差距外归因倾向有极显著的预测作用,主观阶层越低的人越倾向于外归因;不论是基于问卷测量,还是实验启动的主观阶层,效应都是如此(李静, 2012, 2014),而低阶层相对较低的控制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这些结果不仅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即低阶层更多地经济不平等归咎于社会的问题(Kraus, Piff, & Keltner, 2009),而且也支撑了社会认知视角的观点。

3.1.2 不同阶层社会公平感的差异

既然对经济结果的内归因倾向是个体感知公平的基础,那么由此推之,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做出外归因的低阶层群体是否也就更加感到社会不公呢?从理论上、经验上,这似乎完全成立,然而,实证研究中却出现了争议。一项研究结果的多项指标一致显示,低阶层的人反倒更觉得社会是公平的(Jost, Pelham, Sheldon, & Sullivan, 2003)。这一研究反响很大,而在此前后,同样有一些研究基于不同的样本,得到了类似的结论(Jost & Thompson, 2000; Henry, 2011)。这种“低阶层更认为社会公平”的观点被称为地位公正化假设(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Brandt (2013)和 Lee, Pratto 和 Johnson (2011)的研究都运用了跨文化大样本的数据,综合了多项阶

层和公平感的指标,结果都显示低阶层更多地不满社会现状,持同样结论的研究也还有很多(参见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 2013)。

基于研究中存在的争议,课题组基于中国样本考察了这一问题。根据常用的构念和工具,我们选取了两个指标来反映社会公平感。因为地位公正化假设源于系统公正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所以一个指标就是系统公正理论中常用的系统正当性感知;而另一个则是现实社会中被广泛提及的分配公平感。两个研究均在全国广泛取样,结果显示,无论是个人分配公平感还是社会分配公平感,还是系统正当性感知,都是主观低阶层极显著地低于主观高阶层,与国外大样本研究的结论相一致。而且,基于社会认知视角,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归因倾向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样得到了证实,即低阶层更多地感到不公是由于其更多地知觉到了个体经济困境中社会因素的作用(李静, 2014; 杨沈龙, 2014)。当然,目前对此问题的揭示还远远不够,至于为什么有研究会支持地位公正化假设,深层因素到底包括哪些,还有待继续探究。

3.1.3 不同阶层受到不公对待的威胁敏感性差异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低阶层更多地感到社会不公,那么当他们真的遇到不公的情境时,他们又会做何反应呢?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理论观点,课题组引入威胁敏感性的概念来考察这一过程:低阶层情境主义的认知风格使得他们对环境信息更为敏感,有着较强的威胁敏感性,倾向于对威胁产生更强烈的生理、认知和行为反应。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无论是物理方面的威胁(人身安全),还是社会方面的威胁(拒绝、排斥、丢面子等),都显示低阶层比高阶层更为敏感(李小新, 郭永玉, 毕静, 胡小勇, 2014)。但除此之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威胁在弱势群体中尤为突出,一些造成极恶劣社会影响的杀人案也常常因为犯罪嫌疑人之前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可是对于高低阶层在遭遇不公方面的威胁敏感性差异,目前鲜有研究。

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行为实验和生理测量)、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操作性定义(主观、客观)以及三种不同的威胁敏感性测量范式(不公平对待的预先警觉水平、不公平对待的可接受程度、不公平对待引发的生理指标),结果一

致显示,低阶层比高阶层在遭受不公平对待时有着更强烈的威胁敏感性,也即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会遭受不公平对待,更不能接受不公平对待,以及对于不公平威胁会产生更大的生理反应(李小新,2014)。这些结果与社会认知视角的观点和数据一致,即低阶层威胁敏感性更高,而且进一步将社会认知视角中的威胁敏感性扩展到社会公平层面,揭示了高低阶层对不公平的反应差异。

3.2 社会公平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作用研究

上面课题组关注了高低阶层者在感知公平上的差异,从中可见,虽然有少数研究结论不一致,但是绝大部分数据还是显示,在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的低阶层会更多地感到不公,而且他们对不公的反应更为强烈,那么公平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公平的感知和公平的环境又会对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沿着这一思路,我们继续下面的研究。

3.2.1 社会公平感对低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作用

要想改善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就要保证低阶层能够通畅地向上流动,而这又依赖于低阶层者个人目标的追求与达成(Ott, 2010)。然而,对于大多数低阶层者来说,他们的重要人生目标通常是很难实现的(Laurin, Fitzsimons, & Kay, 2011)。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低阶层者的目标达成?根据目标动机理论,支持性的环境比较利于个体达成目标(Fitzsimons & Shah, 2008)。而公平作为目标支持环境的重要一部分,在目标设定阶段,会影响目标的可得性,进而决定了人们追求该目标的动机。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很多研究表明组织公平可以显著地预测目标承诺(Lind, Kanfer, & Earley, 1990; Korsgaard, Schweiger, & Sapienza, 1995)。不过还较少有研究将组织公平扩展到社会公平领域,来考察社会公平对个体目标承诺和达成的影响。

根据 Jost 和 Kay (2010)的观点,最能直接体现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是社会公平感。那么结合我们所关心的社会阶层问题,是否当低阶层感到社会公平时,他们就更容易达成目标呢?对此,我们通过相关、准实验和实验研究三种不同的方法,一致揭示出社会公平感、社会阶层对目标承诺和目标达成的影响存在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首先,社会公平感显著正向影响了低阶层者的目标达成,对高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对目

标达成的影响不显著。然后,阶层对于公平感影响目标达成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目标承诺来实现的: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环境越公平,则其目标承诺水平越高,进而其目标达成得分也越高;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这种效应则不显著(胡小勇,2014)。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会认知视角的观点,也即对于低阶层来说,他们情境主义的认知模式使他们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更为依赖,而高阶层相对不那么受制于环境的影响,因此,促进阶层流动,关键还是要促进不同阶层共享公平竞争,这对低阶层达成个体目标、实现向上流动尤为重要。

3.2.2 公正世界信念对低阶层的双重作用

如果说社会公平感是人对于社会公平与否的直接感知的话,那么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则是人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否公正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具有高公正世界信念的人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杜建政,祝振兵,2007)。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有报”的思想。大量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可以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框架来解释和应对不公平,重建公正感,维护心理健康,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周春燕,郭永玉,2013b)。不过,对于不同阶层而言,情况是不同的。对于唯我主义的高阶层,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可以更好地维护其自尊和自身地位合理性。而对情境主义的低阶层而言,情形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可以促进他们追求长远的学业或职业目标,从而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Laurin et al., 2011)。但另一方面,低阶层更依赖情境信息做出判断,那么当他们持有高公正世界信念时,就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不佳处境是理所当然的,这对低阶层改变群体地位是不利的(郭永玉,周春燕,2014)。

根据这种推断,课题组检验了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低阶层者的双重作用。研究一首先考察了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低阶层者的积极作用,结果表明,公正世界信念更高的低阶层个体有着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研究二进一步表明,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低阶层大学生,在挫折情境下,对长远目标的目标承诺越强,越倾向于选择坚持,并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三则重点关注公正世界信念的另一方面功能:公正世界信念可以提高低阶层者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周春燕,

2013;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b)。可见, 在中国人身上, 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低阶层的这种双重作用有很好的体现。未来研究还应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挖掘这种双重作用的产生机理, 为使公正世界信念更多地起到积极作用寻求更深入的影响因素。

3.2.3 公平回报预期对不同阶层亲社会行为的作用

除了唯我主义与情境主义的核心差异, 社会认知视角还具体指出, 低阶层者比高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Piff et al., 2010, 2012)。然而也有观点认为, 亲社会行为是需要消耗成本的, 而与高阶层相比, 低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会消耗相对更多的成本, 随着消耗的增加, 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减小(Smith, 1998)。Wilson 和 Musick (1997)的研究也发现, 富人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志愿服务, 因为他们更少地受制于自身的工作。

基于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课题组考虑, 是否存在另一个变量, 能够调节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呢? 根据社会认知视角观点, 低阶层者更倾向于依靠他人来帮助自己达成目标(Kraus & Keltner, 2009; Kraus et al., 2009)。而 Wilson (2000)认为, 对于结果的预期会影响阶层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 虽然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受益者不是自己, 但是低阶层者这么做的原因也许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对方公平的回报。也就是说, 低社会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也许部分是因为对他人公平回报的预期。通过采用 2(社会阶层: 高、低)×2(回报预期: 高公平、低公平)的混合设计(其中社会阶层为被试间变量), 实验考察了不同阶层的被试在两种不同回报预期条件下, 亲社会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 回报预期和阶层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当预期对方有较公平的回报水平时, 高低社会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差异不显著; 当预期目标有较低的公平回报时, 低阶层的亲社会行为明显减少且与高阶层差异显著。说明公平回报预期确实改变了低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芦学璋, 郭永玉, 李静, 2014)。这一结果再次反映了低阶层比高阶层更多也更深刻地受到环境公平的影响。

3.3 低阶层感知不公平的应对策略研究

通过 3.1 部分可知, 低阶层倾向于比高阶层更多地感知到社会的不公, 3.2 部分又显示了低阶层对公平的需求和依赖比高阶层更为强烈。因此,

接下来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应该如何从个体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入手, 来提升低阶层的公平感知。

3.3.1 社会限制对低阶层贫富差距归因倾向的调节作用

基于控制感在阶层与贫富差距归因之间的中介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能够提高低阶层对生活的控制感, 使其更多地感到自己可以掌控命运, 应该就能扭转其归因模式。但在目前阶层固化的现实条件下, 单纯地依靠个体的自我调节来提高控制感, 显然是难以奏效的, 因为社会心理受制于社会现实。所以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减少社会条件的限制, 为人们提供更多有利于向上流动的机会, 使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实现改变命运。赵志裕、区颖敏和陈静(2008)在一项模拟社会条件的实验研究中发现, 人们在社会限制相对少的情境下确实具有更高的控制感。还有研究表明, 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个体, 更倾向于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内归因(Whyte & Han, 2008; 王甫勤, 2010)。

因此, 课题组考察了社会限制对于不同阶层贫富差距外归因倾向的调节作用。以 93 名大学生为被试, 采用情境模拟实验的方法来操纵社会限制, 结果发现, 社会限制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 具体而言, 在社会限制相对较少的情境下, 低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外部归因倾向会明显减少, 表明减少社会限制可以促进低阶层更多地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因素实现富裕(李静, 2014)。当然, 社会限制往往不易很快改变,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两条途径可以调节低阶层的归因方式。第一是对其进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干预, 第二是加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开发。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心理资本是指个体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 是可以测量、开发和管理心理状态(仲理峰, 2007)。已有很多研究揭示了二者对于个体提升控制感的作用(Luthans, Avey, Avolio, Norman, & Combs, 2006; 张阔, 张赛, 董颖红, 2010)。对这些因素影响作用的探索和干预, 也许将成为未来该领域研究中很有价值的一种思路。

3.3.2 控制感对低阶层系统公正感的调节作用

既然控制感是不同阶层产生不同归因模式的心理基础(李静, 2012, 2014), 而调节控制感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低阶层的外归因，那么控制感是否可以通过改变低阶层的归因，进而改变其对于社会公正的感知呢？为此课题组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假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存在，即社会阶层通过影响贫富差距归因而影响系统正当性感知这一中介过程，会受到控制感的调节。研究以 208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将其随机分为两个组，通过启动任务让一部分被试暂时体验到较高控制感，而让另一部分暂时体验较低控制感。结果显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在无控制感的情况下，该中介模型成立；而在有控制感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的贫富归因倾向差异不显著，社会阶层与系统正当性感知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中介模型不成立。表明控制感的有无可以通过影响不同阶层个体的贫富归因倾向的差异进而来影响其系统正当性感知的差异：在无控制感时，低阶层比高阶层更多地将贫富差距看作是社会系统的原因，因此也表现出更强烈的系统不公正感；而当有控制感时，低阶层在贫富归因与感知系统公正上与高阶层并无显著差异(杨沈龙, 2014)。这一结果说明，要想让民众更多地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基于自身因素，进而感到这个社会是公正的、合理的，就有必要变革社会体制和机制，设计更公平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出台相应的举措，减少对弱势群体的限制，提升其个人控制感，让他们感到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

3.3.3 不公平对待经历对低阶层威胁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高威胁敏感性的个体更易于焦虑，更倾向于引发不良的人际互动，并且表现出相对更多的攻击性行为 and 退缩行为(李小新等, 2014)。因此，如何缓解低阶层对于不公平对待的威胁敏感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值得注意的是，缓解低阶层对于不公平对待的威胁敏感性，并不是要让低阶层群体面对不公逆来顺受、一味忍让，而是让他们不至于对不公平过分敏感、强烈警觉，总觉得自己所受不公，进而引发一系列适应不良的心理和行为后果。基于已有研究曾考察过受威胁经历对于威胁敏感性的影响(Matthews, Gallo, & Taylor, 2010)，我们尝试从不公平对待的经历这一角度出发对不同阶层威胁敏感性的调节策略进

行探讨。

研究首先以典型高、低阶层为被试，通过实验操纵被试的不公平对待经历，考察他们的回击行为，结果发现相对于没有遭遇不公平的被试，遭遇不公平对待的被试回击行为水平较高；另外阶层与不公平对待经历的交互作用显著，对于低阶层被试而言，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组的回击行为水平显著较高，而高阶层被试中则不存在这种差异。接下来通过问卷施测，分别考察不同阶层的不公平对待威胁解释偏向(将中性信息解释为威胁信息)、不公平对待经历、反社会行为和退缩行为意向，并建立结构方程，结果发现：阶层显著负向预测不公平对待威胁解释偏向，不公平对待经历在二者间起显著的调节作用，不公平对待经历对低社会阶层的威胁解释偏向影响更大；威胁解释偏向显著正向预测反社会行为和退缩行为意向；且不公平对待经历显著正向预测反社会行为和退缩行为意向(李小新, 2014)。这表明，低阶层在生活中遭遇不公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威胁敏感性，进而使其出现反社会行为倾向或者社会退缩的倾向，而如果想要让低阶层改善其威胁敏感性，就需要让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更少地遭遇不公，更多地感到公平正义。

4 小结与展望

社会阶层心理学方兴未艾，其对于高低阶层心理和行为差异的揭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阶层属性给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在该领域，各种研究取向从不同视角出发，关注了阶层差异的不同侧面，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以此为基础，课题组围绕着不同阶层感知公平的差异、社会公平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作用以及低阶层感知不公平的应对策略三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无疑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前景是宽广的，对此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深入。

首先，在概念层面，对社会阶层的操作性定义仍然存在着较多的分歧，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主观阶层与客观阶层的关系问题。从理论取向来看，社会文化视角的代表 Stephens 团队更倾向于考察客观阶层，它所提出的文化心理差异都是基于客观的，也强调主观阶层无法反映阶层心理的内涵(Stephens & Townsend, 2013)；社会认知视角的代表 Kraus 团队则更强调主观阶层，其最新提出的

等级视角就是完全基于主观阶层的,是高度强调个体对自身阶层的体验的(Kraus et al., 2013)。而从研究来看,主观与客观阶层只有中等强度相关(Adler et al., 2000; Kraus et al., 2009)。因此哪一种阶层测量是真正代表了研究者想考察的阶层的实质,两种阶层的研究各有何价值,这需要更多理论和数据来详细阐释。除了阶层,社会公平也很难定义,在组织公平概念已有清晰结构和测量工具的情况下,社会公平该如何考察还莫衷一是(Brandt, 2013; 杨沈龙等, 2013)。目前的研究还基本上只关注此复杂构念的一个侧面,如分配公平、系统公正、公正世界信念等,但一个真正有信服力的社会公平架构及其测量工具,还有待研究者继续探索。

其次,在理论层面,现有的五种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取向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较少,更没有形成一套统合的关于社会公平的理论,虽然Stephens等(2014)对于不平等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他们基本上是在高低阶层文化差异实证证据的基础上推断阶层固化的原因,尚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并且他们也只关注了公平的一个方面,而其他取向对此问题还尚无明确理论建树。未来研究可以在本文尝试的三个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不同阶层理解公平的差异、需求公平的差异、怎样在存在阶层的社会里实现公平等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主题。另外,各取向的理论虽自成一派,但彼此之间并非不可兼容,如社会文化视角和社会认知视角都强调高低阶层自我概念的差异(Stephens, Markus, et al., 2012; Kraus et al., 2012),只是社会文化视角以自我作为阶层差异的心理根源,而社会认知视角认为认知方式的差异更为根本,其实在具体的研究结论上,它们是不存在明显分歧的。因此,在未来建立一个在目前理论基础上的,将各派理论强调的心理基础加以综合的大理论,也许并非不可能。

最后,在研究层面,为了深入探求阶层烙印带给人的影响,当然有必要继续考察不同阶层的心理与行为差异及其深度机制,不过也有必要从单纯关注阶层差异的基础研究扩大到关注阶层流动和不同阶层心理需求的应用研究上来。2015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那么如何才能从心理层面更好地帮助低阶层呢?对此,课题

组考察了从如何改变低阶层的归因模式,到如何增强其公平感、降低其威胁敏感性,再到如何促进其目标达成的一套干预策略,但目前这些手段还是不够系统的,未来研究值得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继续扩展研究思路。从微观上,可以在已有的对心理根源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低阶层难以向上流动的个体内部因素,以培育低阶层更具社会适应性和社会创造性。从宏观上,也有必要把握多种社会现实因素,建立综合模型,找出目前体制中限制低阶层自由发展的弊端,使低阶层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成功。当然,高阶层同样不容忽视,他们相对不必为生计担忧,但他们有着怎样的需求,又应该怎样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探索他们实现目标、获得幸福的机制与干预策略,也是值得探究的,而这一点无论是国内还是美国的心理学家都关注较少。只有不同阶层的成员都能实现生命潜能的自由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 白天亮,曲哲涵.(2010-09-16). 底层人群无背景无身份向上流动困难. 人民日报. <http://news.cntv.cn/20110901/105370.shtml>
- 陈艳红,程刚,关雨生,张大均.(2014). 大学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6), 594-600.
- 戴海东,易招娣.(2012).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阶层流动与高等教育公平. *教育研究*, (8), 67-70.
- 杜建政,祝振兵.(2007). 公正世界信念:概念,测量,及研究热点. *心理科学进展*, 15(2), 373-378.
- 郭永玉,周春燕.(2014). 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的双重作用.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0(1), 63-67.
- 胡壮丽,王孟成,蔡琳,朱熊兆,姚树桥.(2012). 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的初步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 155-157.
- 胡小勇.(2014). 低阶层者的目标追求:社会公平与自我调节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 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社会认知视角. *心理科学*, 37(6), 1509-1517.
- 李春玲.(2010).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 *社会学研究*, (3), 82-133.
- 李静.(2012).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归因倾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 李静.(2014).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心理归因研究.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李小新.(2014). 不同社会阶层对受不公平对待的威胁敏感性差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 李小新,郭永玉,丰静,胡小勇.(2014). 威胁敏感性的概

- 念和测量: 生理和认知两种取向. *心理科学进展*, 22(10), 1608–1615.
- 芦学璋, 郭永玉, 李静. (2014). 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 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37(5), 1212–1219.
- 任春荣. (2010).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的测量技术. *教育学报*, 6(5), 77–82.
- 盛智明. (2013).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基于 CGSS2006 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 33(4), 35–59.
- 王春光, 李炜.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和客观实在. *江苏社会科学*, (4), 95–100.
- 王甫勤. (2010). *社会流动与分配公平感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上海.
- 王甫勤. (2011). 当代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 一项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社会*, 31(3), 155–183.
- 杨沈龙. (2014). *不同社会阶层系统公正感的差异及其机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 (2013). 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 *心理科学进展*, 21(12), 2245–2255.
- 岳昌君, 张恺. (2014). 高校毕业生求职结果及起薪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3 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育研究*, 35(11), 72–83.
- 张阔, 张赛, 董颖红. (2010). 积极心理资本: 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8(1), 58–64.
- 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 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行为间的关系? ——共享内隐论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见 杨宇 (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四辑, pp. 147–17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仲理峰. (2007). 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 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39(2), 328–334.
- 周春燕. (2013). *公正世界信念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与社会功能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a).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4), 636–640.
-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b). 公正世界信念——重建公正的双刃剑. *心理科学进展*, 21(1), 144–154.
- Adler, N. E., Singh-Manoux, A., Schwartz, J., Stewart, J., Matthews, K., & Marmot, M. G. (2008). Social status and health: A comparison of British civil servants in Whitehall-II with European- and African-Americans in CARDI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6(5), 1034–1045.
- Anderson, C., & Kilduff, G. J. (2009). The pursuit of status in social group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5), 295–298.
- Bourdieu, P. (1985).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14(6), 723–744.
- Brandt, M. J. (2013).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5), 765–785.
- Côté, S. (2011). How social class shapes thoughts and actions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 43–71.
- Demakakos, P., Nazroo, J., Breeze, E., & Marmot, M. (2008).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The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7(2), 330–340.
- Fitzsimons, G. M., & Shah, J. Y. (2008). How goal instrumentality shapes relationship eval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2), 319–337.
- Flynn, F. J., Reagans, R. E., Amanatullah, E. T., & Ames, D. R. (2006). Helping one's way to the top: Self-monitors achieve status by helping others and knowing who helps who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6), 1123–1137.
- Gallo, L. C., & Matthews, K. A. (2003). Understand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hysical health: Do negative emotions play a ro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10–51.
- Grossmann, I., & Huynh, A. C. (2013). Where is the culture i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112–119.
- Henry, P. J. (2011). The role of stigma in understanding ethnicity differences in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32(3), 419–438.
- Howell, R. T., & Howell, C. J. (2008).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statu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4), 536–560.
- Johnson, S. E., Richeson, J. A., & Finkel, E. J. (2011). Middle class and margi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stigma, and self-regulation at an elite univers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5), 838–852.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 T. Fiske, D.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1122–1165).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 Jost, J. T., Pelham, B. W., Sheldon, O., & Sullivan, B. N. (2003).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sonance on behalf of the system: Evidence of enhanced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1), 13–36.
- Jost, J. T., & Thompson, E. P. (2000). Group-based dominance and opposition to equality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self-esteem, ethnocentrism, and social policy attitud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3), 209–232.
- Kingston, P. W. (2000). *The Classless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rsgaard, M. A., Schweiger, D. M., & Sapienza, H. J. (1995). Building commitment, attachment, and trust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teams: The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1), 60–84.
- Kraus, M. W. (2010). *Social class, essentialism, and restorative policy decisions* (Doctorial dissertati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 Kraus, M. W., Horberg, E. J., Goetz, J. L., & Keltner, D. (2011). Social class rank, threat vigilance, and hostile reactiv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10), 1376–1388.
- Kraus, M. W., & Keltner, D. (2009). Sig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 thin-slicing approac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99–106.
- Kraus, M. W., & Mendes, W. B. (2014). Sartorial symbols of social class elicit class-consistent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 dyadic approac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6), 2330–2340.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992–1004.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11). Social class as culture the convergence of resources and rank in the social real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4), 246–250.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572.
- 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9), 642–656.
- Kraus, M. W., Tan, J. J. X., & Tannenbaum, M. B. (2013).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81–96.
- Laurin, K., Fitzsimons, G. M., & Kay, A. C. (2011).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the self-regulatory function of justice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1), 149–172.
- Lee, I. C., Pratto, F., & Johnson, B. T. (2011). Intergroup consensus/disagreement in support of group based hierarchy: An examination of socio-structural and psycho-cultural Facto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6), 1029–1064.
- Lind, E. A., Kanfer, R., & Earley, P. C. (1990). Voice, control,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 and noninstrumental concerns in fairness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5), 952–959.
- Luthans, F., Avey, J. B., Avolio, B. J., Norman, S. M., & Combs, G. M. (2006). 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ment: Toward a micro-interven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7(3), 387–393.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2003). Culture, self, and the reality of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Inquiry*, 14(3-4), 277–283.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2010). Cultures and selves: A cycle of mutual constitu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4), 420–430.
- Matthews, K. A., Gallo, L. C., & Taylor, S. E. (2010). Are psychosocial factors mediator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connection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86(1), 146–173.
- 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3(5), 435–454.
- Ng, W., & Diener, E. (2014). What matters to the rich and the poor? Subjective well-being, 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 postmaterialist needs across the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2), 326–338.
- Ott, J. C. (2010).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A Critiqu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1), 125–130.
- 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784.
- Piff, P. K., Stancato, D. M., Côté, S., Mendoza-Denton, R., & Keltner, D. (2012).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11), 4086–4091.
- Sakurai, K., Kawakami, N., Yamaoka, K., Ishikawa, H., & Hashimoto, H. (2010).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men and women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11), 1832–1839.
- Smith, J. M. (1998). The origin of altruism. *Nature*, 393(6686), 639–640.
- Snibbe, A. C., & Markus, H. R. (2005).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4), 703–720.
- 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Markus, H. R., Johnson, C. S., & Covarrubias, R. (2012). Unseen disadvantage: 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ce undermin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6), 1178–1197.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Fryberg, S. A. (2012). Social class disparities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Reducing inequality by applying a sociocultural self model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4), 723–744.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Phillips, L. T. (2014). Social class culture cycles: How three gateway contexts shape selves and fuel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611–634.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Townsend, S. S. M. (2007). Choice as an act of meaning: The case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5),

- 814-830.
- Stephens, N. M., & Townsend, S. S. (2013). Rank is not enough: Why we need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126-130.
- Stephens, N. M., Townsend, S. S., Markus, H. R., & Phillips, L. T. (2012). A cultural mismatch: Independent cultural norms produce greater increases in cortisol and more negative emotions among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6), 1389-1393.
- Whyte, M. K., & Han, C. P. (2008).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1), 29-51.
- Wilkinson, R. G. (1999). Health, hierarchy, and social anxiet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96, 48-63.
- Wilson, J. (2000).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215-240.
- Wilson, J., & Musick, M. A. (1997). Work and volunteering: The long arm of the job. *Social Forces*, 76(1), 251-272.
- Wolff, L. S., Subramanian, S. V., Acevedo-Garcia, D., Weber, D., & Kawachi, I. (2010). Compared to whom?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elf-rated health, and referent group sensitivity in a diverse US sampl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12), 2019-2028.

Social Fairness Researches i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lass Psychology

GUO Yongyu; YANG Shenlong; LI Jing; HU Xiaoy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ubei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Key Laborator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Social class represents the amount of social resources one possesses and the social status one perceives. Its unique concept, widespread functions, profound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s and systematic conclusions as a whole contribute to its cutting-edge status in the 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There are mainly five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ocial class psychology, including labor, health psychology, socioculture, social cognitive and rank-based studies. However few studies were condu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fairness from these approache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exploring difference of perceived social fairnes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nfluence of social fairness o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the strategies of individuals from lower class to deal with social unfairnes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future studies can focus on concept identification, theory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social class; social class psychology; social fairness; social cognitive

作者简介: 郭永玉, 男, 1963年5月生, 湖北随州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1984)、心理学硕士(199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2000)。曾任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2000~2003), 美国 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ITP)访问学者(1998~1999), 英国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心理学院访问教授(2009~2010)。兼任教育部高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 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湖北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心理科学》、《心理学探新》、《心理研究》,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adrid, Spain) 等期刊编委。先后在中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 160 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及主编或参编学术著作或教材 10 余部;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7)、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20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1)等; 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教育图书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优秀教师、湖北省教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主要致力于如下领域的研究: 人本心理学及其当代发展的理论诠释, 人格理论和实证研究知识体系的整合性建构, 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及其现代化背景下的人格与价值观问题, 特别是社会阶层视角下的公平研究以及危机管理中的心理社会支持研究等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现实问题研究受到学界关注。